

导 言

孙中山博士诞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孙博士之死对于急切想使中国相信他们是一片好心的俄国共产党来说，正好提供了一个表示他们友谊的良机。为了纪念孙博士，他们于一九二五年秋季，在莫斯科开办了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这所大学的寿命不长，在一九三〇年秋就停办了。尽管如此，它对于中国国共两党的事态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正如它是二十年代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一九一七年后中俄关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还是国共两党党史的组成部分。

那些曾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以及各种苏联军事院校学习过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拿最近的来说，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选出的九十五名中央委员中，我至少能认出二十七个在苏联学习过，他们主要是毕业于中山大学。在“八大”成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八大”选出的另一个中央委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毛泽东形影相随的陈伯达，也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在六十年代中期，至少有三个省委的成员进过

中大。同时，在大陆中国的中央政府中任要职的至少有十六人，如像刘少奇，在苏联上过学，当然，刘少奇进的是东方共大。在党政军中还可列举出好多人来，这里我只提出几个明显的例子。

再者，二十年代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人中，在国民党中央曾经而且依然在起着重要作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苏联顾问米哈依尔·鲍罗廷的倡导下，按照类似共产党标本的路线进行了改组。在这里，我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单，虽然我将只提到其中的少数几个人。蒋经国将军是中山大学毕业生，一九六五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现在是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一九六九年，他成为行政院副院长，相传他在台湾的势力仅次于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故的国民党情报首脑郑介民将军，也进过中山大学。郑介民当过已故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局首脑戴笠将军的助手，郑曾负责蒋介石的个人安全多年，被公认为蒋介石最亲信的侍从之一。蒋介石夫人的得力助手皮仪淑和她的丈夫谷正鼎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生，谷是立法院的显要委员。谷正鼎的哥哥、国民党中央执会常委谷正纲也进过中大。在台湾的中山大学毕业生还有内政部副部长邓文仪；在国民党中央任过多项要职、曾一度负责国民党军政人事工作的刘咏尧立法委员肖赞育和吴家钰监察委员张秀兰前交通部长何重汉。何其实是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但他和附近的中山大学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中大就餐。还有卜涛明，一九六四年死于台湾，台湾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公认的苏联问题权威，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后来又进过中山大学。王崇武在大陆时当过济南市长，后曾任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现在仍是该院的高级干部，也是东方共大的一个毕业生。我确信，用不着一一罗列二十年代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学生。我还深信，我这里提到的名字，

就足以说明这些留俄学生在国共两党中均起过重要作用。这些名字告诉我们,尽管中山大学已停办多年,它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影响也许还清晰可见。

中山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上也起了作用。在分析导致共产党中国和俄国冲突的早期因素时,我们必须看到,首批俄国训练的,矢志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中国人一回国,就竭力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场权力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结果毛泽东甩掉了所有为俄国人尤其是斯大林特感兴趣的干部,如陈绍禹、秦邦宪、陈昌浩和后来的张闻天、杨尚昆等人。他们的下台,无疑是苏俄和共产党中国关系恶化的内在因素,也是表明这种关系恶化的一种征兆。而且在作者撰写本书时,现在据说在莫斯科的陈绍禹还在继续反对毛泽东的斗争。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四天,《消息报》摘要发表了陈绍禹最近写的反毛的长篇攻击。

中山大学也是中国托洛茨基运动的摇篮,它地地道道是从俄国移植到中国的。在中国发起托洛茨基运动的中国人中,绝大多数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陆渊、梁干乔、宋逢春、肖冰洋和李梅五。只有王平一和刘仁静等少数几个早期的中国托派来自苏联其他学院。托洛茨基本人直接介入了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尔后的中国托派运动。

当然,中山大学也许还影响到中国其它方面的活动。例如,一些大陆中国学府使用的教学法,就很类似中山大学的那一套。还可以指出的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改革,是中山大学一批中国学生着手进行的,俄国人物色这些学生专门从事此项工作。已故的吴玉章就是这些学生当中的一个,也使这一工作取得了显著

的进展。吴玉章在发展汉语拉丁文字拼写方法上起过特殊作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后,正是吴玉章领导了大陆中国的文字改革机构。

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这一点上,中山大学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大承担了卷帙浩繁的翻译任务,译成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中文经典著作。这一工作的成果是,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并尽量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名词中文译名的统一。而且,不少中山大学学生回到中国后,继续从事这一重要的翻译工作。他们的事业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特别对党的干部的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山大学对后来中国发生的好多事件有其影响,这我将在这一研究报告的本文中加以论述。

中山大学不单单对中国有影响。俄国人显然也从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的经验中得到好处,他们在一九六〇年秋在莫斯科创办人民友谊大学时,这些经验对他们无疑是有用的。固然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彼此不同,人民友谊大学又同前两者有别,然而人民友谊大学显然继承了前两个学校的传统做法。当东方共大和中山大学在二十年代创立之际,它们反映了苏联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多少有点类似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革命事业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了不发达国家身上,这次不只是在东方,而是遍及于全世界。人民友谊大学因而建立,以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东方共大的校名上有‘共产主义’字样,当然它只招收共产党人。但中山大学就招收了非共产党人,而且,只是在国共分裂以后,直到一九二八年,它才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由于人民友谊大学招收非共产党人学生,我推测它的渊源直接地可以追溯

到中山大学的头三年。人民友谊大学的名称之前冠以已故的非洲革命者帕特赖斯·卢蒙巴之名,但这所大学却不教卢蒙巴的思想。而在中山大学也确实从来没有教过孙中山的著作。但是,这两个学院课程上的重要差异,无疑会使人感到,它们之间相隔数十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俄国人也从他们早期创办的院校中总结了经验。在中山大学只开社会科学的课程,当然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重点是放在自然科学上。当然,东方共大、中山大学和人民友谊大学的确也有某些共同点。在所有这三所学校,苏联人都感到他们一定会通过进入这些学院的学生而得到更多的好处。至于苏联究竟得到多大的好处,我留待历史学家去作结论。

第 一 章

中山大学的诞生

新时代的曙光

辛亥的革命,似乎把因外国侵略和内部动乱而削弱、并且常常被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带进了一个新时代。推翻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亚洲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共和国。更重要的是,革命唤起了国民精神,从而为继续前进和光明未来开辟了道路。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列宁在《真理报》上以《新生的中国》为题,发表了他对中国革命有远见的评价,并对这个拥有四亿人民的睡狮给予了他最热情的祝贺:

先进的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斗争了。^①

辛亥革命给予中国的深远影响和由此引起的巨大变化是不言自明的,这并非列宁的发现。可是,对这一革命的国际意义作出精确的分析,则应归功于列宁,而不幸这一事实却为大部分历史学家所忽视。在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得权力后,他对辛亥革命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中国和其它殖民地

国家的政策。

早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列宁在读了孙中山博士《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后,写了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论文,详细论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和孙博士的政治学说: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 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 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②。

在列宁看来,孙中山代表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他还写道:

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③

这里所表达的见解,成为列宁起草并为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础。它也为未来孙博士与苏俄的联盟开辟了道路。因为以这一联盟为基础而制定的支援中国国民革命的战略,也自然源出于列宁关于亚洲的资产阶级和农民构成一种历史的进步力量的估计。

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内忧外患,因而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得到一天的和平与繁荣。然而,革命精神却从未熄灭。它总是一触即燃,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而达于顶点。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境界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五四运动源起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巧妙

的融合。哈洛德·伊罗生在他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中,对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作了如下精辟的总结:

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它开创了第二次中国革命。它似乎激发了一股蓄之已久的惊人的活力,一切传统观念和行为习惯均告分崩离析,这些东西的被冲决,使这个国家举国上下都受到影响。城乡男女青年开始同旧日的家族和农村长辈权威们决裂,两代人中间打开的裂缝人们再也无法弥合。陈旧的处世之道和思想方法依然统治着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但它们正受着致命的冲击。在大专院校中掀起了巨涛狂澜。凡尔赛会议后对西方幻想的破灭,使得学生们众望所归转向了俄国革命。这一股新的潮流汇集了欧洲早已流传的各种主要社会思潮,给中国带来了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而打开了新的眼界,在思想、道德和文学方面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而且大大加速了政治变革和社会冲突的深度。一切社会阶级都登上了政治舞台。旧的政治组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新的组织纷纷出现。^④

俄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口号,越来越吸引了长期遭受外国凌辱和摧残的中国人民的注意力。而孙中山显然是第一个公开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热忱并想方设法和苏俄建立关系的中国要人。正因此,孙博士在一九一八年从上海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他在电文中称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着共同的目标。他预言,俄国和中国革命将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⑤这一电文实际上表明了孙博士对同西方交往感到灰心,转而同情俄国革命。

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对孙博士数月前的电报作了热情的答复,恭敬地称孙博士为“尊敬的导

师”并且强调了俄国与中国革命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它们具有重大的共同目标。^⑥诚然,很可能是孙博士和苏俄领导人之间的这些早期交往,影响了尔后的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外交行动。例如,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加拉罕签署的取消沙俄在华特权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著名宣言,就是给“中国人民和南方、北方中国政府”的。^⑦当然,孙中山当时领导着华南的革命运动。之后,孙博士和俄国领导人继续来往,导致了孙博士和苏联官员阿道夫·越飞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共同声明。同年,米哈依尔·鲍罗廷到达广州,担任孙博士改组国民党的顾问。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接着国共合作,有力地说明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正在与时俱增。这一影响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

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国的政治局势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期,孙博士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动力。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是由于内外交困,别无他循,西方列强对华政策所表露出来的无知和自私及其对孙博士的革命运动漠不关心,迫使他转而求助于苏俄。一九二四年,孙在写给一九二三年他派往苏联考察的蒋介石的手札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⑧

然而中苏合作并不是仅仅出于中国人向往十月革命和西方对孙的革命愿望置之不理。另方面的原因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对东方兴趣正与日俱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然而,这一革命浪潮在匈牙利和德国革命失败后很快就消退了下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俄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他

们的孤立处境，开始在东方认真地寻找同盟者。中国及其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成为天然的目标。至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派他的特使马林到中国，并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桂林与孙博士会晤。马林一回到俄国，就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详尽报告。马林坚决主张联合孙博士远比联合军阀吴佩孚或陈炯明为佳。马林感到，孙博士一生革命并通晓社会主义理论，因而将是共产国际最理想的同盟者。一九二三年孙中山、越飞发表共同声明后，孙博士和苏俄的联盟即告正式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虽建立于孙去世之后，却是孙和俄国人这一联盟的产物，而且是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了作为中苏关系发展史的产物外，中山大学的成立和关闭还体现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再者，它还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雏形。中大的中国学生乃是标志着时代的整个激烈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中大，有具有各种倾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派，有国民党的代表，也有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其他各种集团和派别。

然而，中山大学不仅是中国政治舞台的缩影，它还是苏俄领导人之间斗争的一部分。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一逝世，俄国人中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像两只斗鸡一样地互相厮杀；而中国问题也就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每一方都标榜自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他们争着当中国人民的发言人。正因此，中大的中国学生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而且卷进了苏俄政治的漩涡。

进一步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九二五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标志了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这以前，大部分中国学生去欧洲、美国或者日本深造。的确，中国政府一八七二年第一批派出国的留学生三十人是去美国。可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学生去过中国巨大的邻邦俄国；也没有多少中国人去俄国学习，因为当时都认为俄国落后。可是现在，五十年以后的情况大变，由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和苏联建立了联盟，苏联成为中国青年最想去学习的地方。这本身说明，至少有好多的人不再把俄国当成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这段期间，只有不多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去俄国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而在一九二五年，几百个中国人开始成群结队去俄国上中山大学。

然而，中山大学的开办不仅引起了中国学生数量上的变化。就在欧美回来的学生把他们记着‘科学’与‘民主’内容的课堂笔记和书籍，也许还连同他们的梦想，一起带回国来的同时，留学俄国的学生们带回来的却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及其实施政治纲领，还建立了为实现这些理想的党的关系。^{*}而正是这些留俄中国学生归根到底要在掌握中国的命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孙博士逝世和鲍罗廷宣布创立中山大学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带了包括孙夫人和汪精卫等人一行十九人，离开广州去北京。这次北上的目的是要实现孙中山‘复兴中国’的崇高志愿。他本想通过与段祺瑞、张作霖

^{*} 译者注 由于安全的缘故，当中国学生越过中俄边界时，俄国情报人员搜查他们，并把他们的书籍和课堂笔记全部没收。

将军协商建立新中国,不幸,孙博士由于肝病复发,在天津几乎耽搁了一个月,他和他的使团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抵达北京。

那时我是北京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对孙中山的到达北京,我至今历历在目。在他到来两天前,北京下了大雪,所有的街道都上了冻,路很难走。加之气温降到了零下。可是,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往北京饭店。

孙博士到达的当晚举行了提灯大会。我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从段祺瑞为孙中山安排的铁狮子胡同临时住地到天安门,宛如一条火龙。我们渴望着向孙博士表示敬意,并且盼望他能讲一次话。可是我们到达以后,孙博士因为病情沉重不能给我们讲话。而由孙的英俊的广东籍助手汪精卫代他出面,代表孙中山向我们表示他的谢意。我们随即在失望中散去。

孙中山的病情日益危急。请了六、七个北京的外国医师来看过,可是孙博士病情毫无好转。最后,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一位俄国肝病专家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然而一切努力均告无效。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孙博士撒下了一个仍在奋斗的中国和她正在遭受苦难的人民与世长辞。

孙博士病笃的时候,由汪精卫草拟了一份遗嘱。二月二十四日,汪念给孙博士听,并得到了他的同意。三月十一日,孙博士终于在他的同志们的请求下签署了这份遗嘱和给苏联的一封信。信显然是陈友仁用英文写成的。这封信在他逝世后才公开发表,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⑨*

• 译者注 书中所引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与《孙中山选集》第二卷第九二二页上的中文原件有以下出入：(1)中文原件抬头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2)中文原件中有“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一句，而英文引文中无此句；(3)段落划分与中文原件也有数处不同。此处中文译文系按本书英文的段落和内容与《孙中山选集》校对后译出。

孙中山逝世的翌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给共产国际主席戈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发送了孙中山逝世的讣告。在这份讣告中，国民党表示希望继续与俄国合作。讣告说：

由于孙中山逝世，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失去了它的领袖。孙中山的事业尚未完成，将由他的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正受着和帝国主义结盟的反革命势力的包围。我们深信，你们作为列宁的真正信徒，会同我们这些孙中山的后继人继续并肩战斗。^⑩

国民党的讣电和孙中山的信件同时发到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和中国人一起，沉痛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和苏联的伟大朋友。斯大林对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讣告复了唁电，电文如下：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失去国民党的领袖、中国工农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争取中国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向你们表示哀悼。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信无疑，孙中山虽然逝世，但他的伟大事业将永世长存，永远活在中国工人农民的心中，中国国民党将不顾它的敌人而在伟大的反帝解放斗争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直至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的最后胜利。

孙中山去世了，孙中山的事业万古长存！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万岁！^⑪

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共产国际所致的复电中，重申了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和孙中山精神的立场。电文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竭尽全力使各国全体工人广大群众明确了解孙中山的事业的伟大意义。^⑫

为了纪念孙中山,共产国际还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书》和《告世界工人书》。^⑬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维经斯基等人都专门写了悼念文章。文章中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其中,以拉狄克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最为典型。他在题为《孙中山的遗产》的文章结尾写道:“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一往无前。在遭到每次失败之后,他重新站起来,重新总结经验,更加努力学习。”^⑭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长期以来一直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真理报》的文章中把孙中山和洪秀全,中国革命和太平天国起义做了比较,他还结合他个人的体会阐述了列宁关于中国人民的思想:

一九一六年的一天,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一些布尔什维克在伯尔尼集会讨论民族自决问题。列宁在会上突然提议,布尔什维克将来应和中国革命联合起来。这一提议当时似乎是一种痴人说梦!真想得出来,俄国无产阶级会同亿万中国人并肩战斗。在与会的五六个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人想像说,如果他们命长,也许会看到这个梦想实现。

在一九一八年中国和俄国还被捷克人、社会革命党人和高尔察克分割开来的时候,列宁有一次问到在那些移居俄国的中国劳动者中,是否可以挑出革命人士去同孙中山接触。现在我们已经同中国人民建立了联系。今天我们赋予中国革命者的使命则是扩大我们与亿万人民的接触。^⑮

显然是根据列宁的思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得出结

论,确实不假“孙中山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得出这一结论后,苏联领袖们决定在中国革命中投入更大的资本。同一年中在莫斯科建立的中山大学,就是苏联最重要的一笔投资。

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政府,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境界。这个国民革命政府,吸收了新鲜血液,巩固了革命力量,号召群众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在这一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下,苏联加快了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的计划。

米哈依尔·鲍罗廷,俄国派驻国民党的特别顾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学。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还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获得了通过,并且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并在委员会建立后迅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开始选拔学生。

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仅仅在广州一地就有一千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由于广州是那时全国的主要革命中心,选派委员会选拔的三百四十名学生中大多数(一百八十人)来自这个城市,设在广州的黄埔和湘(湖南)、滇(云南)军校各取十名。有五十名来自上海,五十名来自京津地区。还有二十名学生由鲍罗廷特别推荐。鲍罗廷推荐的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这些特别选拔的学生免除参加竞争考试。在广州选拔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是国民党员,上海和京津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数是共产党员。

特别选拔办法包括一组三种考试。我有一个在广州参加考试的大学同班同学对这一考试程序作了如下的描述: